

陶淵明論集



陶淵明論集

钟 优 民 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陶渊明论集

钟优民 著
责任编辑：李恕基
装帧设计：王诚龙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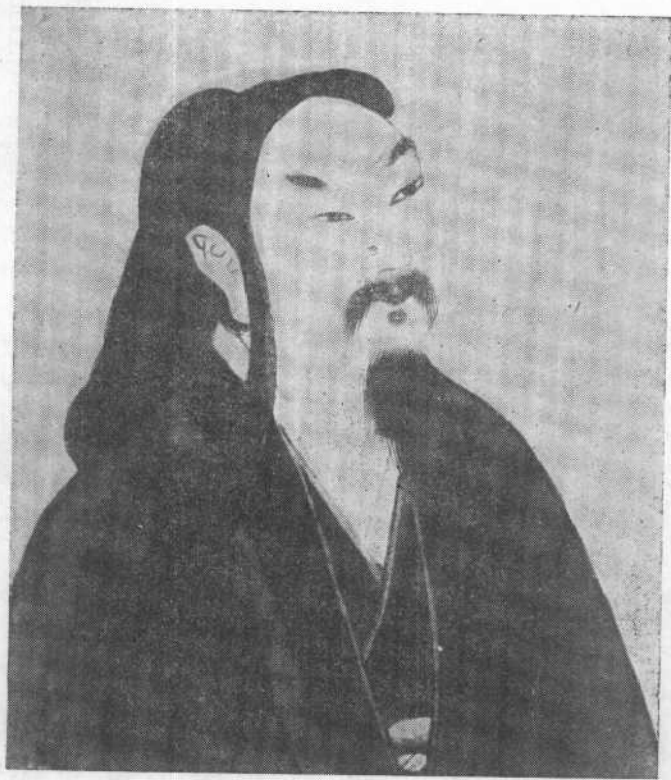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5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2次印刷

字数：174,000 印张：8.5 印数：12,801——18,800

统一书号：10109·1361 定价：0.68元



陶 淵 明

陶淵明集卷第一

詩九首 四言

停雲一首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 鍾湛新膠園列初榮願言

不

弗一作

從歎息

想一作

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閑飲東廛願言懷人 仁一作舟車

靡從東園之樹枝條 作 載榮競用新好

《陶淵明集》宋刻遞修本

（北京圖書館藏書）

虎溪三笑

——从“程氏墨苑”（西谛藏）

郑振铎著《中国
（文学史）插图》



庐山图（江西通志）

（日本大矢根文次郎著《陶渊明研究》插图）

目 录

一	导论——东晋的社会面貌·····	(1)
二	陶渊明的家世·····	(11)
三	陶渊明的经历·····	(26)
四	陶渊明的政治倾向·····	(44)
五	陶渊明的思想·····	(61)
六	陶渊明的咏怀诗·····	(82)
七	陶渊明的田园诗·····	(131)
八	陶渊明的哲理诗·····	(164)
九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	(195)
十	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	(230)
后	记·····	(269)

导论——东晋的社会面貌

陶渊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年（晋哀帝兴宁三年），卒于公元四二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他的大半生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陶渊明降世之时，离西晋灭亡（公元三一七年）虽已四十八年，但东晋这个偏处一隅的小朝廷，却始终羽翼未丰，被民族的、阶级的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纠缠，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当时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匈奴族刘聪推翻西晋之后，羯、氐、羌、鲜卑等族相继起兵，各据一方，史称“五胡十六国”，直到鲜卑人拓跋氏建立北魏，吞灭北凉（公元四三九年），北中国才再次统一。南北分裂时期，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进攻。在北方的进犯面前，东晋统治集团仍不能励精图治，团结御侮，而是因循苟且，人各其志，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享受而不能自拔，对于收复失地的事业，从未真正下过决心。大批兵权在握的军事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唯有公元三八三年（太元八年）的淝水之战，因前秦王国内部不稳、东晋上层集团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特别是广

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抗击外来威胁的斗争，结果苻坚大败，南方取得完全的胜利，一度给广大人民带来莫大的希望，对保障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朝廷起了很大作用。但外祸稍缓，内乱继起，人民群众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美好愿望，终成泡影。

腐朽没落的东晋政权，对外妥协退让、无所作为，对自己统治区的广大劳动人民，则采取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反动政策。当时的豪门士族，大量占有良田山泽，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自己手里，供其挥霍浪费。他们攫取的手段，有的是由皇帝赏赐，如王导在钟山附近就有赐田八十多顷，谢灵运亦曾要求赐给他会稽东部的回踵湖，以便决水为田；有的是恣意侵霸，很多“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值”，大地主刁逵家就是“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他们疯狂地搜括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如谢安曾“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饌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晋书·谢安传》）社会生产资料虽然大都控制在少数士族大地主手里，国家赋税徭役却反而落在寒门小民身上。因为东晋沿袭西晋旧制，士族享有各种豁免特权，甚至依附他们的佃客，也可以不向国家纳税，只对豪强有租课负担。这就迫使更多农民成为贵族豪门的佃客，大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再加上东晋建立以来，长江上游荆州地区一直被地方割据势力把持，东晋政府的费用进而集中落在三吴人民身上，造成赋税激增。太元二年政府规定，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到太元八年，就猛涨至每口税米五石（每石十斗）的惊人地步。除口税外，还有田税和

各种复杂的沉重负担。就徭役而言，亦曾出现空前畸重的局面。依照官府规定，“东晋之制男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丁出一运丁。”（《隋书·食货志》）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如东晋升平（穆帝年号）年间，庾和出任丹杨尹时，即曾“表除重役六十余事”（《晋书·庾亮传》），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猛于虎的苛政，统治集团中个别有识之士也不能不为之惶恐。范宁出为豫章太守前曾上疏疾呼：“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鰥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晋书·范宁传》）果然不出所料，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榨取，终于激发起人民愤怒的烈火，这就是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爆发的晋末农民大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司马元显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征调江南诸郡从奴隶身解放出来的佃客入伍：“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晋书·会稽王道子传》）由于征调佃客损害一部分地主的利益，因而一些失势的南北大族也乘机参加起义队伍，企图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孙恩、卢循都是失势的北方大族，但斗争的主力仍然是对东晋士族门阀的反动统治有着刻骨阶级仇恨的劳动群众。这次历时十二载、活动遍及当时南方主要地区的农民大起义，给东晋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使之濒于名存实亡的绝境，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怒潮，残暴的反动统治集团采取血腥的镇压，官军所至，烧杀抢掠，

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的灾难。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百姓散在江湖采梠，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陶渊明的故乡江州浔阳，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为长江中游重镇和京都金陵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正是义军与晋军、以及军阀之间混战的地区，“戎车屡骇，干戈溢境”，造成的破坏甚为惨重：“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邻近的荆州，损失也非常严重：“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繁苦，童孺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或越徕应召。”（《宋书·武帝纪》）长期的动荡不安，使江南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尽管尖锐激烈，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却从未停息，反而愈演愈烈。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众所周知，西晋政权是靠豪门士族的拥戴而得以推翻曹魏、取得天下的；东晋政权也是以北方士族为主体而有江南士族参加建立起来的。东晋诸帝大都昏庸无能，哀帝司马丕迷信神仙，“不识万机”，废帝司马奕“终日酣畅，耽于内宠”，简文帝司马昱“幼而岐嶷，即位后拱默取道、常惧废黜”，安帝司马德宗“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他们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是傀儡，大权旁落，号令威权多出强臣，皇室和士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逆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晋道弥昏，道

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末衅，桓玄藉运乘时，加以先父之业，因基革命，人无异心。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清宇。”（《宋书·武帝纪》）司马氏皇室为了取得士族地主的支持，对豪族势力的发展一般都采取放纵宽容的政策，致使“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同上），士族地主进而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他们又都担任郡、县的官吏，除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外，同时掌握着强大的政治权力。司马氏皇室为了保障朝廷的财政赋税收入，曾经几次试行“土断”，企图使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向国家纳税服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因受到豪族势力的顽强抵抗，都未能实行到底，生动地反映出代表皇室利益的中央政权和代表士族利益的地方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深刻矛盾。东晋在公元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之前，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都和这种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南迁的北方士族之间，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各派军阀之间一系列的逐鹿战争。地方上大批拥兵自重、觊觎神器的骄兵悍将，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常呈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引起各派势力极大的不安，导致上层集团的明争暗斗，乃至发展成为相互火并的严重局面。东晋初期刁协、刘隗等与王敦之间的矛盾，庾亮和苏峻之间的斗争，东晋中叶以后桓温家族与谢安、王坦之两大家族之间的较量，司马道子父子的垄断朝政，排挤有权势的士族，引起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兴师问罪，进而发展为桓玄的倒晋自立；最后以刘裕吞灭诸雄、导演“禅让”喜剧而告终。所有这些，都是统治阶

级内部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东晋一代，继续沿用曹魏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办法，作为维护士族门阀的腐朽统治的工具。官吏的录用，职位的确定，都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相沿成习，很难更改。早在西晋即已形成“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恩幸传论》）的政治格局，到东晋更有充分的发展。东晋朝廷实际就是一个以世家士族为主体的庞大官僚集团，士族自恃门第高贵，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高位要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于治国安民之道，往往一窍不通，专事游荡，纵情声色。他们代表着社会上最顽固、腐朽的反动势力。在各级政府里，他们或“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或“构造同异，兴树祸隙”，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混乱已极。就当时改良吏治、复兴国家的需要而言，无疑正是一个亟须不拘一格、显擢贤能的时代，但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却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为国家献身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很多有理想、有才能的正直文人在东晋所面临的残酷的政治现实。

东晋一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与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当然很有关系。面对儒学的衰落，统治集团从维护王权的需要出发，曾企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成效甚微，正如《晋书·儒林传论》所指出的：“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膠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

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儒学的支配地位既已丧失，经师在社会上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晋书·徐邈传》）但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不能轻视，它主要保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里。东晋名儒范宣“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他在江州地区提倡儒家经学，影响很大：“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渔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晋书·儒林传》）与儒学并存的是门阀贵族的思想意识——玄学。西晋玄风大盛，是促成西晋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士族出身的王衍（字夷甫），在宦途上专事清谈，不理政务，反而青云直上，跃居要职，后来当了石勒的俘虏，临死前方才懂得“向若不祖尚玄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到东晋，桓温亦曾慨然长叹曰：“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但东晋朝野上下，绝大多数显要名流，并没有认识清谈玄学的危害，反而愈演愈烈。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庾亮等人，就甚喜清谈。丞相王导曾将一批著名的清谈家召集到一处，并“自起解帐，带尘尾语殷（浩）曰：

‘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世说新语·文学》）到会稽王司马昱（公元三二〇——三七二年）当权的时代，东晋的清谈玄学更发展到顶峰。他本身“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晋书·简文帝纪》），并搜罗了大批清谈家聚集在自己周围，优渥有加。东晋玄言诗的泛滥成灾，正是玄学影响的深入在文学创作上的集中反映。清谈玄风之盛，竟使某些佛门名僧也跟着钻研《庄子》，且所得甚丰：“《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东晋名僧）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世说新语·文学》）当时某些儒学大师亦复如此，如一向标榜自己“言谈不及《老》、《庄》”的范宣，当客人问他“人生与忧俱生”之语出自何处，他立即回答：“出《庄子·至乐篇》。”客问：“君言不谈《老》、《庄》，何以识此？”他只好笑着说：“小时尝一览。”更有人企图引老、庄道家之旨救儒家之弊，塞争欲之门，提倡儒道调和，东晋初年的李充就在《学箴》里主张“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规千仞之门而遂适物之迹，逐迹逾笃，离本逾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晋书·文苑传》）这些都说明《老》、《庄》之学在东晋时期的泛滥横流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

道教是继承秦汉以来的神仙家的衣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老子被宗奉为教主。宗教就其本质来说，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但农民起义有时也披过这件外衣。东晋葛洪是道教史上最著名的教徒，他创立了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新道教，以反对流行于民间，往往为起义农民所利用的原始道教，后世道教徒奉为经典的《抱朴子》一书即出自其手。他提倡“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抱朴子·自叙》）一整套谬说，以迎合妄图长生不死、永享人间富贵的反动统治阶级，影响很坏。在东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名士，信仰其说、实践其事者，大有人在。时代的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人民生活的极度痛苦等，这一切都是传播宗教的良好土壤。道教之外，佛教在东晋亦有很大发展，东晋好几个皇帝都信仰浮屠之学，孝武帝司马曜迷信佛教，立精舍（僧徒讲道说法之所）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迅速，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为此，桓玄曾和当时佛教首领慧远，围绕佛教地位问题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论。桓玄为维护世俗地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的权威，与部下桓谦等人反复讨论，并两度致书慧远，提出沙门应致敬王者，企图压抑佛教僧侣。慧远从维护僧侣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抗争。桓玄还用儒家思想指斥佛教的虚妄：“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与释慧远书劝罢道》）并下令裁减淘汰僧侣，痛陈佛教伤风败俗，祸

国殃民：“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匱，名器为之秽黷。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与僚属沙汰僧众教》）恰中时弊，不为虚语。桓玄的主张由于大多数门阀士族的不支持，始终未能付诸实践；他篡位后，更偃旗息鼓，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见解。但这场争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是应该给予足够估价的。往后陶渊明与慧远关于形神问题的辩论，也可以看作是这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兴盛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社会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和制约的，东晋文学亦不能例外。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统治。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陶渊明生活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他并没有象清谈玄学家那样狂放不羁，也没有象佛教徒那样无虑无营，在现实生活、文学创作上，都是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一种单纯自然的新颖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